

「美」斯蒂芬·卡尔博格 著  
张翼飞  
殷亚迪 译  
苏国勋 策划



# 韦伯的 比较历史社会学 今探

国际公认的韦伯研究专家卡尔博格代表作  
对韦伯作品的全新分析，重构其研究策略

海外借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 斯蒂芬·卡尔博格 著 张翼飞 殷亚迪 译 苏国勋 策划

# 韦伯的 比较历史社会学 今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今探/(美)斯蒂芬·卡尔博格(Stephen Kalberg)著;张翼飞,殷亚迪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书名原文:Max Weber's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Today

ISBN 978-7-208-16318-8

I. ①韦… II. ①斯… ②张… ③殷… III. ①韦伯(Weber, Max 1864-1920)-比较社会学-思想评论 ②韦伯(Weber, Max 1864-1920)-历史社会学-思想评论 IV. ①C91-03 ②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29639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 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今探

[美]斯蒂芬·卡尔博格 著

张翼飞 殷亚迪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4  
字 数 344,000  
版 次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6318-8/C·608  
定 价 85.00 元

# 目 录

全书导论 \_\_ 1

## 第一部分 重构主题

导论 \_\_ 11

第一章 马克斯·韦伯对理性的分类:理性化历史进程的分析基础 \_\_ 15

第二章 观念的“动态自主性”对社会学家是否重要? 马克斯·韦伯论彼世  
救赎宗教的起源以及当代美国社会群体的形成 \_\_ 45

第三章 世界观对过去与现在的影响:马克斯·韦伯论一个被忽视的社会学  
概念 \_\_ 75

## 第二部分 韦伯的因果分析模式

导论 \_\_ 97

第四章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过去与现在恒久而紧密的交织 \_\_ 101

第五章 宏观比较:防范措施(precaution)、可能性、成就与限制 \_\_ 119

第六章 理论框架与因果方法论 \_\_ 137

## 第三部分 重构韦伯作品的重要进展:儒教、种姓制度与古犹太教的兴起与发展

导论 \_\_ 151

第七章 儒教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_\_ 153

第八章 印度种姓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_\_ 173

第九章 古代以色列一神教的兴起与发展 \_\_ 187

#### 第四部分 应用韦伯 I：深层文化的重要性

导论 \_\_ 203

第十章 禁欲新教的遗产和美国人的独特性：美国的政治文化 \_\_ 205

第十一章 现代公民身份的文化根基 \_\_ 215

#### 第五部分 应用韦伯 II：多因果分析与脉络——遇合分析

导论 \_\_ 237

第十二章 文化悲观主义的起源和扩张：20 世纪早期德国公私领域间的关系  
\_\_ 239

第十三章 当代联邦德国的文化和对工作的定位：一项韦伯式的型构分析和  
比较分析 \_\_ 261

#### 第六部分 结论：把韦伯带回

附录 I 社会诸领域在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中心地位：维尔纳·桑巴特的  
挑战 \_\_ 299

附录 II 马克斯·韦伯的情感社会学：一个初步分析 \_\_ 307

参考文献 \_\_ 317



个由非人化的工具性关系支配的“铁笼”？在迎来现代社会为发展个人主义、提高生活水平和挣脱封建锁链带来的种种机会时，韦伯意识到，对于那些试图为自己的生活确立一种全面的、基于价值意义的人来说，这个社会却几乎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明确的指导方针（2005：251—272）。他问道，我们能在新时代即将到来之时有尊严地生活吗？

2 这些问题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与同时代那些通过哲学思辨来寻找答案的欧洲人不同，韦伯所从事的却是异常广泛而详实的经验研究。他所关注的诸问题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在他看来与之前普遍存在过的、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他坚持认为，西欧和北美先于中国和印度产生这种工业化的、高度组织化的、基于中产阶级的经济。为什么这种产生于 18、19 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从没在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出现？科技创新、商业扩张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因果作用？出于什么原因，一种随着 17 世纪清教主义出现的“经济伦理”使有条理的工作、财富和利润的积累神圣化——以及如何评价这种“新教伦理”的因果影响？类似的问题促进了他关于民主、法律、支配（Herrschaft）和国家的广泛的比较历史研究。〔1〕

韦伯的社会学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被极为广泛地翻译，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被阅读和讨论。即使他最严厉的批评者也经常借鉴他的作品。

本书首先重构了韦伯全集中的几个主要议题和他的因果分析模式，然后运用他的方法论来 a) 在其著作中以三个不完整的研究为例，重构其因果论证，以及 b) 提供对四种不同的发展问题的因果分析。这样，韦伯（的方法论）就得以被应用于后面的章节中。本研究旨在通过这种方式展示韦伯社会学的持久性及其在今天的实用性。〔2〕下面让我们更精确地介绍一下。

本书的第一部分深入重构了三大主题：韦伯对四种“理性类型”的定义及其对西方历史演进中“理性化过程”的影响的分析；“出世”救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世界观”（Weltbilder）的兴起和影响。第二部分重构了韦伯应用在其比较历史

---

〔1〕 韦伯关于西方独特性的精彩概括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构想，见他为《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2009：233—250）所写的前言。

〔2〕 在这个问题上，本书基于我先前的作品（1994）。见下文。

研究中的复杂的因果分析模式。本书用三个章节试图展示其概念和研究程序的严谨性。通过参考这种分析模式,本书在第三部分重建了韦伯作品中几个不完整的案例:中国儒教的兴起和扩展,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古代以色列的一神论。

最后,第四和第五部分的研究超越了“重构韦伯”的议程,旨在展示其方法论强有力的因果分析能力。本书将用他的方法论来解释四个独立事件:a)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b)现代公民身份的文化基础,c)文化悲观主义(Kulturpessimismus)在韦伯时代的德国的广泛传播,d)在当代德国,工作(work)的社会“位置”。在此过程中,本书试图与当代著名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流派进行对话。

本书对我的《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1994)一书进行了补充。<sup>〔1〕</sup> 这项研究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对韦伯的研究进行重构,二是与现代研究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的三种方法进行比较,这三种研究方法分别为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解释性历史学派,塞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的国家中心论,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见 Karlberg, 1994: 1—19, 195—204 各处)。通过与最近几个学派的对话来“解释韦伯”构成了本研究的一个主要思路。如前所述,虽然本书重新构建了韦伯的研究策略,但这本书还追求另外的目标:它重新构建了韦伯的三个主要论题和其著作中三个突出的因果分析;并将韦伯缜密的方法论应用于四个研究案例。据我所知,关于其作品的大量评论性研究还从未涉足过此领域。<sup>〔2〕</sup>

如上所述,下面的大多数章节都涉及日常比较历史社会学中常见的因果分析概念、研究策略和模式。希望与韦伯的这种持续对话能揭示其观点的独特性,以及他在当今方法和学派中的独特优势。贯穿全文的重点将是:

- 文化,尤其是宗教的因果影响;
- 韦伯对于当前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与过去的紧密联系;
- 他关注的是“深层背景”(deep context)原因,无论这些原因是基于宗教信仰、统治地位、经济还是法律的“社会领域”;
- 韦伯关注原因和严谨的因果分析模式,尤其是他对多种原因及其动态性的

〔1〕 与之前的这本书一样,本书将给出所引用的韦伯文本的英文与德文版(其中有两章除外),德文文献的相关信息见参考文献。

〔2〕 所有章节(除了附录)在此前都公开发表过。此处对它们进行了修改;一些进行了实质性的重写。每章的初版发表时间都在章节的开头标明。

(dynamic)或遇合的(conjunctural)互动研究;

- 他注重模式行动的共时(现在/现在)和历时(过去/现在)互动的研究取向;
- 韦伯对概念的构想和运用(“理想型”),包括为经验研究提供指导的基于不同领域的理论框架;
- 他强调建立严格程序的重要性,这些程序既包括理论框架,也包括对经验案例的因果解释;
- 韦伯将价值作为决定人们常规行动(regular action)的潜在原因;
- 他重点关注价值、思想观念与经济、支配和权力利益的持久互动;
- 韦伯坚决反对一切的有机整体论学派,反对将社会视为群体和重要社会领域(例如,经济、统治、宗教、法律和地位荣誉等社会领域)所组成的庞大的多元集合;<sup>[1]</sup>
- 他认为,团体和组织只是由人们的各种模式化行动取向所构成的;
- 最后,韦伯认为竞争状态——甚至是冲突状态——通常是普遍存在的,贯穿每个社会的多个群体。

必须在本研究的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不仅仅是对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匆匆一瞥。本书所有章节都呈现了多维度的讨论,而非(对他思想的)快照或简单的重述。大致遵循其社会学思想,本书 a) 致力于列出影响新行动模式兴起和扩展的脉络行动模式(contextual patterns of action); b) 相较对单一因果规律的还原,更强调多种常规行动模式的遇合性(conjunctural)或动态性(dynamic)的互动;c) 相对于对普遍法则的阐释,更强调对那些独一无二案例的解释——以及能够影响它们产生和发展的那些短期或长期的行动模式。正如本研究将证明的那样,韦伯放弃了线性进步观,新进化论的确定性,周期和阶段性理论,历史哲学概念,以及所有坦途和捷径。他在整个历史进程(及当代)和所有文明中都发现了矛盾和难题,他的作品充满了无法预知的和看似矛盾的结果。

韦伯被称为“难懂的理论家”可谓名副其实。但我们已经尽一切努力去展示其比较历史学的核心特征和分析力,使它变得易于理解。下面的全书概述将深入介绍每章的内容,勾画出全书的轮廓并展示出其逻辑走向。

[1] 生活领域(domains of life),社会领域(societal arenas)以及生活范围(life-spheres)在文中都用作同义词。

## 全书概述

第一部分(第1—3章)讨论了三个关键主题。这三个主题都明显贯穿于韦伯的全部作品中。在他试图解释西方的独特性并系统分析其因果根源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章重构了四种“理性的类型”(Rationalitätstypen)——形式理性、实质理性、理论理性和实用理性——它们分散在韦伯作品中的各个角落。总之,在韦伯对贯穿历史(尤其是西方发展史)的理性化过程的分析中,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概念。在结论中,这个讨论转向研究理性的种类是如何将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遍的困境概念化的。

第二章重构了韦伯对西方“出世救赎宗教”起源与发展的分析。在韦伯看来,仅仅关注政治和经济因素是不够的,先知和宗教取向的知识分子对神义论中永恒问题的信仰也必须得到重视。<sup>〔1〕</sup>一种来源于神义论困境的“动态自主过程”(dynamic autonomous)构成了它们发展背后一个强大的动力。韦伯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自主发展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群体的形成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在这条漫长道路的尽头,矗立着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和“现代经济伦理”。其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轴线在这一章中通过与美国社会学各个流派的持续对话被进一步展现出来。

第三章提供了宗教领域“自主性”(“autonomy”)的另一个例子。韦伯认为,宗教的世界观(Weltbilder)构成了人类文明中的一个首要轨道(Gleise),而经济和政治利益都要在这个轨道中运行。通常,“由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就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使的行动向何方而去”。(2009:241/252)。这章的讨论重新构建了韦伯关于世界观起源的分析,探索了这些世界观的影响,考察了他关于世界观衰退后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后果的论述。在这一章中,我们再现了韦伯与美国社会学派之间针锋相对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4—6章)不再讨论韦伯作品中的中心主题。在作者的《马克思·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1994)的基础上,概述了他的因果分析模式。这三章

〔1〕 所谓神义论,指全能全善的上帝所统治的世界上为何会有邪恶的问题。见本书边码第48—60页。

定义了他研究过程的主要方面。

虽然韦伯被公认为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奠基人,但实际上韦伯所采用的因果分析系统模式却很少(在后人的分析中)被清晰地展现出其分析能力和实用性。<sup>〔1〕</sup> 不论是其方法论中被人熟知的部分[例如理想型,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以及“解释性理解”(Verstehen)的方法]<sup>〔2〕</sup>,还是他作品的一部分(比如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卡里斯玛式及其例行化,阶级和地位群体的区别,权力与权威的区别),都不能展现出其丰富的研究策略。其碎片化和不完整的作品中所深深埋藏着的因果分析模式——包括他的研究步骤——必须被重新建构,只有这样它们的效用才会显现出来。本书第二部分中介绍的基础性概念、步骤和预设,将在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中一再得到运用。

第四章以韦伯对过去与现在密切交织的关系分析为中心。它强调了韦伯作品中不同寻常的历史细节,检验了反对将韦伯的历史观视为围绕“科层化”、不可避免的“祛魅”与线性“理性化”过程的各种理由。本章的讨论还要反驳那些将韦伯描述为支持两分法历史观(过去是魅力型统治,现在是官僚式法理型统治)的评论家,以及那些将他的作品理解为支持历史进化论的评论家。(作者在)第四章指出,他们的评论仍然是位于宏大层面(global level)的分析,与韦伯详细的、多维的、基于经验的文本(分析)不一致。

他的社会学必须被理解为强调模式化的社会行动,本章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团体由这些模式化的社会行动构成,相应地,这些团体深处于“社会领域”(例如宗教、经济、法律、地位群体和支配领域)之中。此外,广泛的多元因果分析和在广泛的群体背景中来认识群体,是他研究的一个特色。韦伯研究方法的这些基本特征为他在其比较—历史社会学中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提供了基本机制,它们也使悖论、反讽和不可预见的后果得到了承认和概念化。他坚持认为,所有以宏大概念和线性发展路径为导向的评论都忽视了历史的微妙平衡、融合、分裂以及多元交织。

第五章继续探讨韦伯的主要研究步骤,重点关注其经验研究在宏观比较研究

---

〔1〕 尝试以多种方式将韦伯的分析步骤和分析策略从他的经验研究中提取出来并系统化展示的作品也不多。见卡尔博格(Kalberg, 1994:14—19)。

〔2〕 这些概念将在第四、五、六章讨论。

层面的有效性。这一章我们首先发现,在某些方式中他的概念似乎无法执行严格的比较——然后,局面很快扭转了:经检验我们发现,韦伯的研究策略的确能够帮助比较研究。他主要的启发性工具——理想类型——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广泛的模型建构也同样重要。

第六章重建了他的因果方法论(*causal methodology*),检验了其理论框架[植根于韦伯的三卷著作《经济与社会》(1968)]中广泛的多元因果关系和主要阶段。他区分了辅助性的(*facilitating*)和必要性的(*necessary*)常规行动,共时的和历时的行动模式,以及脉络—遇合(*contextual-conjunctural*)的常规行动。在这场讨论中,其方法的严谨性显而易见。这些阶段也为第三部分的大规模重建打下了基础。

第三部分重构了他的文本中几个不完整的因果分析: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和扩展(第七章),印度的种姓制度(第八章)和古代以色列的一神论(第九章)。每一个讨论都展示了韦伯是如何以第四、五、六章所阐释的概念、程序和区别为基础,进行系统的和多元的因果分析的。

必须承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011)中明显的“唯心主义”(“*idealism*”)远不能体现出其比较历史文献中典型的程序(见 2011:178—179/205)。同样,韦伯社会学中常见的主题——例如,卡里斯玛及其例行化,通常认为的从传统的支配形式到官僚主义的发展——也未能充分体现出他复杂的研究策略。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第 10—13 章)进一步说明了韦伯的广泛影响。这几章将他严谨的因果分析模式应用于独立的案例;事实上,这样做是为了显示它在今天的实用性。这几章都强调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如果要解释事件的起源和发展,必须有多种原因存在,也强调行动模式不可避免地嵌入到其他常规行动模式的背景中。在这些章节中,韦伯的很多研究策略与当今大多数学派的研究策略截然相反。

第四部分展现了韦伯方法论发现并概念化一个“深层文化”(deep culture)的能力。第十章描述了北美殖民地时期和早期美国政治文化的明显特征。利用韦伯的方法,本章提供了关于它起源的部分因果分析。韦伯认为,“政治伦理”行为在美国社会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location*),某种程度上,这是禁欲主义新教在 17、18 世纪影响的结果。这场讨论还考察了禁欲主义的新教遗产如何生动地体现在 2004 年美国总统竞选的主题:“道德价值”上。

第十一章运用韦伯的概念和研究步骤考察了现代公民身份的“文化基础”,发

达的公民责任观念、社会信任、社会平等主义和“世俗取向”的个人主义似乎不可或缺。禁欲主义的新教被理解为一种“深层文化”的组成部分,支撑着现代公民身份的每一种特征。

第五部分(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进一步严谨地运用了韦伯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多元因果分析,以及因果关系的脉络—遇合(contextual-conjunctural)构造模式。第十二章探索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文化悲观主义”的起源和扩张。这一章仔细分析了德国的经济、政治和职业生活领域,例如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重两极分化以及路德教价值观的强大影响力。通过与美国的政治文化相比,德国政治的独特性被显现出来。与几个比较—历史社会学派的对比再一次突出了韦伯分析模式的独特性。

第十三章调查了今日德国社会中工作的特定“位置”。根据这种“韦伯式结构形态”(Weberian configurational)分析,几个领域的竞争——工作、休闲以及私人领域——部分解释了这个位置。美国再次扮演了一个对照案例的角色——即帮助德国突出其独特性的对照案例。

总的来说,本书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涵盖面极广。这两部分讨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现代公民权的文化基础,世纪末(fin de siècle)德国的文化悲观主义,和当代德国社会中工作的重要性。虽然覆盖面广,但这些研究都有共同之处:它们都利用了韦伯的因果分析模式,都展示了这一模式广泛的分析能力。此外,这几章都追求一个目标:那就是试图清楚地说明韦伯是如何将概念和研究策略应用于因果分析的。这些概念和步骤在第二部分中被定义过,也体现在第三部分中对韦伯关于儒教的兴起、种姓制度和一神教分析的重构中。

韦伯的比较历史作品以连贯严谨的概念和步骤为基础,它们一起阐明了一种“韦伯式”方法(Weberian approach)。他强调多维理论框架、多重原因、过去和现在的深层连锁关系,以及模式化行动在常规行动的复杂环境下的嵌入性。以上种种,读者均可在后面的章节中明显看出。虽然作者早期对韦伯的研究(1994)侧重于对其研究策略的重构,但本书坚持认为,韦伯创造的概念和这些理论武器确实可以被用来揭开事件出现和发展背后同时起作用的多种原因。若他的因果分析模式能被重新应用,这将为今天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带来非同寻常的意义。

# 第一部分 重构主题

没有什么东西本身是“非理性的”，这仅是从某个特定“理性”的角度(*vantage point*)看的结果。对于一个不信教的人，所有宗教组织生活的方式都是非理性的；<sup>9</sup>对于享乐主义者，所有对生命的禁欲都是“非理性的”，即使在与它对立的终极价值看来，这是“理性的”。如果希望我的文章能作出些贡献的话，或许是它能够揭示“理性”概念的多种面向。在此之前，它好像被认为是简单而直接的。(2011: 292, 注 10/35, 注 1; 黑体为原文所加)

在各种众多的教条背后，矗立着一个立场，即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事物是特别“无意义的”。因此，它们暗含了如下要求：世界秩序在总体上以某种方式可以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种要求是真正的宗教理性主义的核心……这个形而上需求的手段、结果以及效力是各不相同的。(2011: 242/253; 亦见 1946b: 325/538, 352/364; 1968: 450—451/275, 563/341, 458/279, 540/328, 427/260)

宗教和人都并非摊开的书。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而非毫无冲突的逻辑或者心理组合的产物。它们经常被一系列动机所推动，这些动机中的任何一个，假设被单独且一贯地遵行到底，都会挡在其他动机前面或超过其他动机。在宗教事务中，“一惯性”是例外而非普遍法则。(1946d: 291/264)



## 导 论

第一部分将重构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中包罗广泛的核心主题。<sup>〔1〕</sup>

10

马克斯·韦伯以其对“理性化”和“理性化进程”的论述而闻名于世。这些复杂且多维度的概念，连接着韦伯篇幅庞大而又“零散”著作的不同方面。本书第一章将根据韦伯划分的“四种理性类型”——形式理性、实质理性、理论理性和实用理性——对这些概念进行介绍。

很少有人通过呈现韦伯经验研究中广阔视野和分析范围来处理这些构想(constructs)。这里，我们把它们从韦伯一系列丰富的文本中抽离出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界定并重新进行建构。这些“类型”以不同的形式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理性化进程的基础，而接着将要探讨的就是这些构成形式。第一章将通过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方面和困境进行概念化而探讨四种理性类型的解释力。同时，贯穿本章始终的是与当代社会学领域主要流派的对话，而第二、三章中亦复如此。

第二、三章明显转向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和拓展研究。这两章都把焦点从韦伯的经典文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011)上面移开，而该文本着重分析了一套宗教价值——一种“新教伦理”——如何成为一种世俗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来源。因此，对韦伯观点的简要阐述，将引出第二、三章的讨论。

根据韦伯的观点，这种“精神”具有重要的宗教根源，尤其是在(a)禁欲新教教

---

〔1〕 与滕布鲁克(Tenbruck, 1980)和亨尼斯(Hennis, 1987, 1996)的进路不同，第一部分并不企图框定一个唯一的、遍及韦伯“零散著作”之中并能将其统一在一起的主题。相反，从一开始本书就认为，韦伯的社会学贯穿着五六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在作者看来，这些主题的密切相关性使得将其中任意一个拔高到“主题”地位的尝试都不太可能。

派和教会中；以及在(b) 17世纪神学家和牧师或“清教神学家”的教牧训诫中。在16和17世纪，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在广大信徒中引发了深深的焦虑和担忧，其中那个时代最主要的问题(*the over-arching question of the area*)在于：“我是得救之人吗？(Am I among the saved?)”根据这种预定论思想，大多数人的命运已经被审判，而“善功”绝不会改变这永恒的裁决。面对教众的不满，一些清教神学家开始对教义作出新的解释：允许虔诚的信徒相信他们是被上帝拯救的选民。韦伯在此找到了一种系统的工作伦理和追求财富的根源。

首先，清教徒认识到，上帝希望虔诚的信徒在它的世俗王国创造出丰裕和财富，以此来增加它的威严与荣耀。为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大能的神，命令所有人都应该工作。而且，它“希望”(He “willed”)，清教徒能够有条不紊地(*methodically*)工作，因为在一项职业或“天职”(Beruf)中持续地劳动，是可以“取悦它”的；而这抑制了人们的自我欲望，给信徒确立了规范，驯服了动物性欲望(它会扰乱信徒对上帝及其诫命恰当的专注)，并打消了信徒对自己救赎状态的疑虑和担忧。进而，清教徒开始相信，他们热切的奉献、行为端正的能力以及辛勤工作的精力，一定是源自上帝——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以这种方式，信仰、行为和有条理的劳动向信徒及其共同体证明着，一个威严的上帝在他们“中间”“行使着”神圣的力量，而上帝是不会向随便什么人(*to just anyone*)给予它的力量的。实际上，只要信徒发现有能力强有条不紊地工作，他们就会认为，他们获得了为上帝所喜的标记(*sign*)。他们是(或者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预定的选民。因此，就一个人的救赎状态和那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是上帝的选民吗？”——而言，劳动赋有重大意义。此处预设了一种天命的(*providential*)特征。

最后，有条不紊的工作以另一种方式被正当化。鉴于上帝希望建立一个富足的世俗王国来增加他的荣耀，信徒可以由此合理地推论，人们为了社会的富裕而生产出巨额的财富就构成了他们拥有神性的积极标志。实际上，仅仅是经由全知全能的上帝之恩宠而得来的个人财富，变成了宗教德行和救赎标志的重要证据。在宗教氛围浓厚的17世纪，财富正是基于此种意义才被重视，而并非因财富本身。

因此，既已在天职当中工作，财富也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财富被正当化，并且充当了财富拥有者得到拯救的标志。将财富持续地用于投资而不是挥霍在世俗享受上，证明是一种为上帝创造富饶的世俗王国的更为有效的手段。相应地，不寻常的物质成就必定出自这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之手，因而也得以正当化。